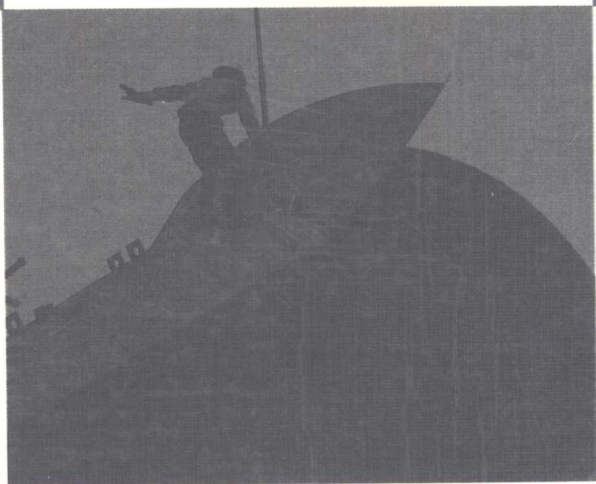


台灣經驗40年 系列叢書

台灣 民間產業 40年



王克敬 著



台灣民間產業

四十年

台灣民間產業40年 作者簡介

王克敬

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於花蓮市。畢業於中興大學財稅系及政大新聞研究所，曾經擔任華視新聞雜誌執行製作、工商時報專欄組記者等職務。現任自立晚報專欄組副主任。

「台灣經驗四十年叢書」序

人類寶貴的台灣戰後歷史經驗

李鴻禧

台灣位於太平洋盆地西緣，孤懸歐亞大陸東岸海上；居日本，琉球、台澎、菲律賓諸環繞亞東列島羣之中樞，在人類遠洋航海史才祇數百年的史實裏，台灣的地理位置具有相當的邊陲性，同樣的，台灣歷史在整個人類史，甚至中國歷史上，也居於相當邊陲的地位。十六、七世紀，泰西各資本主義國家，逐漸相繼形成，藉着日益進步的遠洋航海技術，開始從事有組織之殖民運動，西班牙侵入呂宋，葡萄牙略據澳門；葡萄牙的航海者在北進航途上，看到一綠色蒼翠的島嶼，喊出：「美麗島（Isla Formosa）」；從此「美麗島」台灣才開始受到歐洲葡、西、荷、法、英等殖民主義國家，以及東方中國、日本等近鄰的注意。

由於這種地理和歷史的邊陲環境和背景，所以荷蘭人雖然早在一六〇二年進攻澎湖，一六二四年並由台灣西南鹿耳門入據現在台南西端的台江；西班牙也於一六二六年侵犯基隆，一六二八年佔據淡水，在台灣駐兵築城遂行局部統一；但是在嗣後三、四百年間，台灣一再捲入各大國家競爭攪奪的漩渦；即從荷蘭逐出西班牙勢力，明鄭驅退荷蘭，再經鄭克塽降清東寧王朝敗亡，以至於甲午戰敗清廷割讓台灣予日本，第二次大戰日本戰敗陳儀任台灣行政

長官爲止；這些政權或長或短地佔領統治台灣全部或局部；可是對有關台灣問題之研究，除了對經濟、地理、產業、商銷一類，曾有功利實益底關心外，就有關台灣之歷史文化、人類宗教、政治民生方面問題，則顯示相當冷漠忽視之態度；對台灣問題所做學術研究，業績自然較爲貧乏。甚至，到最近一、二十年，儘管台灣的國際政治力學上的關鍵地位，受到重視，台灣的經濟成長繁榮，在國際上也廣被讚美；可是，有關台灣史、台灣問題的學術研究，仍然一如曩昔台灣的地理、歷史邊陲性質，被冷落棄置於國際學術研究的邊陲。

不能否認的，針對台灣這三、四百年的歷史，確是有些學者專家，就有關台灣的歷史文化、經濟地理，政治社會乃至民族人類各方面，加以調查研究、分析詮釋，提出相當有深度、有價值的學術著作，頗有裨益於台灣問題之學術研究。台灣由於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洗禮較慢，以現代社會科學之學術研究方式來研究台灣問題，起步也比日本落後得多。因而，雖有早期連橫撰述「台灣通史」，對台灣史料調查蒐集，綜合整理，頗具工夫；但是日據時代日本學術界對台灣問題之研究業績，更有可觀。像伊能嘉矩氏的「台灣文化志」係三卷三千餘頁之巨著，記述涉及清朝前後有關台灣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宗教、教育、人類、民族、學藝等的綜合研究，資料蒐集廣博細膩，論文撰寫客觀嚴謹，學術水準與研讀價值均高。而矢內原忠雄所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也能秉持學者良知，廣泛而深入地分析日據時代台灣的經濟、政治、教育、法制各方面的問題；依其深厚之經濟學學識，言簡意賅地指出日本侵略台灣之目的，在於發展日本經濟；客觀而誠實地剖析日本統治台灣的本質，乃是帝國主義之殖民主義運營，成爲有關「日本治下之台灣」的經典著作。與前述伊

能嘉矩所著：「台灣文化志」成爲有關「清朝治下之台灣」的最佳著述，並列爲學者研究台灣史之必讀典籍。

此外，日本學術界中，竹越與三郎的「台灣統治志」，山川均著：「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之台灣」，平山勲之：「台灣社會經濟史全集」，中村孝志撰：「台灣史概要」，尾崎秀樹的：「舊殖民地文學之研究」，井出季和太所寫的：「台灣治績志」，東嘉生所著：「台灣經濟史概說」，東鄉實與佐藤四郎合著：「台灣殖民發達史」，山邊健太郎之：「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持地六三郎著：「台灣殖民政策」，片岡岩著：「台灣風俗志」等等學術著作，不僅在時間上，貫串台灣最早期氏族共同經濟時代，稍後的掠奪經濟時代，以至於封建時代、資本主義殖民時代；抑且在空間上，關涉到經濟、政治、社會以至文化、風俗各方面，蒐集調查不少彌足珍貴的史料，研究提出頗多啓人思考、發人深省的理論和見解。尤其較無台灣總督府及其所屬官署，和由其囑託研究編撰之書籍或研究報告那種濃厚之政治目的與偏見色彩，而成爲研究台灣史之重要基礎資料。

然而，事實上，對台灣史與有關問題之研究，在日據時代因政治環境的特殊，台灣人之研究業績固然受到相當影響；惟在戰後，「台灣研究」已逐漸蔚爲風氣，到最近十年更蓬勃繁盛。原先，在戰後最初十年中，一方面，發生不幸的「二二八事件」，事後政治陰霾也延續籠罩了幾年；另一方面，正逢大陸淪陷，山河變色，中樞踉蹌東渡來台，經濟社會秩序紊亂不安，從而，對台灣的學術研究未能隨「回歸祖國」而迅速展開。不過到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台灣研究」已逐漸熱絡起來；研究著作水準也愈益提高，當時在台灣，不僅將康熙五

十九年（一七二〇年）陳文達編著之〈鳳山縣誌〉全十卷，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林豪之〈澎湖廳志〉全十三卷，光緒後期官方編纂的「台灣通志」全四冊，以及其他台灣各地「地方志」的早期史料尋出而復刻出版。同時，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刊出「增修台灣省通志」前後，包括台北市、台南縣及高雄市和其他縣市，也紛紛編纂各該縣市之地方志。使「台灣研究」因焉有屬於自己、並較殷實貼切的研究參考資料。

早期台灣各地方志之尋覓復刊，以及六十年代台灣省與各縣市地方志之編纂刊行，使早年來台之台灣先民筆路藍縷以啓山林的拓荒奮鬥精神，在經日本官署長年刻意封緘、扭曲醜化之後，得以重新發揚。因此，儘管當時官方瀾漫一種氣氛，認為強調台灣史及從事「台灣研究」，就是在強化地方意識，和「台獨」呼應或鋪路，是學術研究之禁忌或禁區；但是仍有不少學者專家，樂於投入這方面之研究，並有相當優異之成績。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之後，「台灣研究」涉獵愈益廣泛，著作之水準也愈益可觀。像周憲文著：「清代台灣經濟史」，丘念台著：「嶺海微觀」，陳紹馨之：「台灣的社會變遷與人口變動」，汪知亭撰：「台灣教育史」，盛清沂與王詩琅合著：「台灣史」，謝里法著：「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王詩琅的「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等，都有相當的研究水準。最近數年，自立晚報出版之「台灣研究」系列書籍中，林黎著「蓬壺擲勝錄」，洪震宇的「台灣農村經濟研究」，戚嘉林著：「台灣史」，吳三連、蔡培火等合著：「台灣民族運動史」，鍾孝上著：「台灣先民奮鬥史」，張炎憲、李筱峯、莊永明等合著：「台灣近代名人誌」；以及帕米爾書店出版之「台灣研究」書籍，像王曉波所編：「台胞抗日文獻選編」，同王曉波所著：

「台灣的殖民地傷痕」、「走出台灣歷史的陰影」、「被顛倒的台灣歷史」、「台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運動」，葉榮鐘著、李南衡編：「台灣人物羣衆」，侯立朝：「台灣經濟雨夜花」；其他像吳瀛濤所著：「台灣民俗」、「台灣諺語」，洪惟仁著：「台灣禮俗語典」，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文獻資料選集」等等；也都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厚實了「台灣研究」的基礎資料。

抑且，值得注意的是，戰後有不少台灣留學生，在國外也熱心的從事「台灣研究」，並且發表了學術水準頗高的著作。其中像江丙坤著：「台灣地租改革之研究」，涂照彥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劉進慶著：「戰後台灣經濟分析」，黃昭堂著：「台灣民主國之研究」、「台灣總督府」，戴天昭著：「台灣國際政治史研究」等，都很受日本學術界的注意和重視。由於這麼多人關注投入「台灣研究」，又有如此良好的研究成績，我們有理由、也有信心認為未來「台灣研究」，必會逐漸脫離其邊陲地位的。

然而，在回顧這三、四百年來「台灣研究」的發展，瀏覽前此「台灣研究」著作後，難免感慨良多，而有諸多問題梗介於懷。第一、早期較具學術水準與價值之「台灣研究」著作，大多出諸日本學者手筆，惟中日兩國間，歷史傳統思想的迥異、殖民統治立場的隔閡、民族情感、文化之差距，以及接受西方文明之快慢，都會影響其著述之客觀性。尤其是日本學者開始熱衷於從事「台灣研究」時，已都在「大正民主時代」之後，即由「昭和元祿時代」逐漸轉入「大東亞戰爭」之前夕，日本帝國主義之「殖民至上」氣氛，已不容像山川均所著：「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之台灣」、或矢內原忠雄所寫：「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那

樣，客觀率直地剖明日本治台乃是帝國主義之殖民運營。加上，當時台灣總督府自然會就有礙其殖民形象之各種政治、社會、經濟之資訊，予以隱匿或變造。這種客觀環境終使部份日本學者之「台灣研究」，外觀上雖具有體系完整之架構及證據充分之註腳，實質上，則立論評析內心多所顧忌，佐證史料也多謬訛不實，深深影響其研究品質水準。

第二、台灣歷史與「台灣研究」，在整個人類史，甚至中國歷史上，一直居於相當邊陲的地位。在清末官僚有所謂：「台灣島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割讓出去並不可惜」的對台偏見和蔑視情況下，當然不會重視台灣史及「台灣研究」。日據時代，日本治台以遂行其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為至上命題，當然就更會設法排拒梗阻「台灣研究」。不幸的是，戰後台灣光復未幾，由於發生「二二八事件」，及其善後處理之未臻適當，於是乃有部分台灣意識較強者，在海外主張「台灣獨立」。政府疑慮「台灣史」及「台灣研究」，會提升「台灣意識」甚或惡化為「台獨思想」，遂對「台灣史」及「台灣研究」，懷抱警惕戒慎態度，使之萎靡縮瑟於學術研究及學校教育之邊陲。這種錯綜複雜的歷史發展，竟然使住在台灣島上的台灣人，都成為無法尋根的拓荒者；換言之，台灣老一輩受日本教育的懂得日本歷史，中年以下受我國教育的熟悉中國歷史，不分老少都知道世界史的梗概，只有對台灣歷史反而幾近於無知的狀態。很可惜的，過去有關台灣史或「台灣研究」之著作，有的學術水準太高，無法為一般大眾所理解接受；有的則是所研究的問題過於專門深奧，不是普通人民所能研究或有興趣閱讀者；因而，對提昇國人對台灣史之理解，或激發國人對「台灣研究」之興趣，難以充分發揮其俾益功能。

第三、在台灣三、四百年歷史中，台灣長年淪為荷、日等列強攫奪之殖民地，或忝為中國統治的化外之地——邊陲孤島。祇有在戰後這四十年才顯彰出其獨特的地位來；不但在國際政治力學多極均衡之磁場中，居於緩衝穩定的關鍵而受各國重視；在經濟成長、開發繁榮的「開發過程」和優異成績上，也廣受國際社會的讚美和模仿。戰後這四十年寶貴的歷史經驗，無可置疑的，是台灣史上最彪炳璀璨、最值得借鑑中外，當然也最值得載諸史簡、傳諸後世的。然而，令人極感遺憾的是，往昔所遺的有關台灣史和「台灣研究」著作，往往遭逢雙重障壁，減低其價值與意義。換言之，即一方面，研究撰述者懷於現實環境的陰霾凜冽，易觸忌諱招致困擾；所以「日據時代」學者熱心研究「清治時代」的台灣；同樣的，戰後現代學者也多趨向「日據時代」的「台灣研究」，而對最近四十年來的台灣史或台灣問題之研究，大多心存顧忌、僅量迴避；以致最寶貴、最有意義的「台灣經驗四十年」的研究業績，反而顯得相當貧乏。同時，另一方面，現在為數並不算多的有關戰後四十年的「台灣研究」著作；不但有的書籍內容過於深奧專門，非一般民衆所能理解接受；而且大體來說，這些著作專門分野也過於零散細分；迄未有體系地企劃分工來研究撰作；因而國內外關心台灣史及「台灣研究」者，無法借助現有書籍資料，以較短時間及精力，對「台灣戰後經驗四十年」做通盤而簡明的認識理解，俾能據以迅速進入自己專攻或關心的分野。中外不少歷史學者，在觀察我國目前投下不少經費心力於中國近代史之研究教學之同時，對台灣史之研究與課程安排却相當冷漠忽視，往往感到疑惑不解、搖頭嘆息，其理或在於此。

「戰後台灣經驗四十年」，事實上在最近幾年來，已經引起國際學術界濃厚的研究興

趣，特別是從政府執政黨決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研擬改革國會結構、開放外匯管制、允許大陸探親等，大幅政治革新後，世界新聞焦點常會對準我們，研究台灣的熱潮也隨之益發熾熱。今（一九八七）年夏天，美國亞洲學會以「台灣未來的途徑」為研究主題，在美國舉辦了一個頗具規模、與會學者水準也高的研討會，使得長年來祇能瑟縮隱躲在國際學術研究邊陲的「台灣研究」，終於也能登堂入室，成為國際學術界關心研究的對象。

造成近年來這種國際學術界對「台灣研究」之濃厚興趣，其原因固然錯綜複雜不一而足；不過高棣民（Thomas B. Gold）教授之名著：「台灣奇蹟中國家與社會之角色功能」中，指摘：「何以在大陸時期，被視為腐化、暴力、無能的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却能成功的完成內部改革，締造高速的經濟發展，同時兼顧政治、社會的穩定？」這一台灣發展奇蹟中的疑問之分析研究，可能就是關鍵之所在。不過，究竟什麼因素使台灣戰後四十年，締造了發展的奇蹟？學術界見仁見智、爭訟不已。有些人援引五、六〇年代歐美盛行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認為台灣從戰後一片廢墟的低開發國家，發展成現代接近已開發國家之原因，乃是因為台灣接受西方「科技經濟複合體」之結構，實施其「發展途徑」之行動模式，亦即使經濟自由化、資本主義化，社會多元化、分工化，政治擴大參與、提高效率等；因而導致國家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結構逐漸現代化，創造了「台灣奇蹟」。這種論說在詮釋台灣工業化、資本主義化、都市化、社會化多元化方面，雖然頗有說服力；但是若用來解釋台灣的高速發展，尤其是政治經濟不同步發展，社會文化不齊步提升方面，恐怕破綻過多，難以圓滿。

相反的，另有些人援引來自第三世界、於七十年代大為流行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強調歐美的「現代化理論」，建基於歐美「核心」工業國家對第三世界「邊陲」落後國家之剝削榨取上。認為台灣經濟發展指標雖極出色，但是做為以歐美為「核心」之世界經濟體系之「邊陲」體質，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因經濟急遽成長而加速惡化。這種論說在警惕台灣經濟快速成長中，應避免淪為工業先進國之附庸而受「核心」對「邊陲」之剝削方面，雖然頗有說服力；但是對台灣經驗之與第三世界大有不同；以及台灣戰後發展過程中，國家政治權力之運作因素高於國際政治權力甚多之現象；却難給予合理的詮釋。固然，另有一些人深感無論「現代化理論」或「依賴理論」，要做為能適合世界各國之「全盤理論」，在世界各國歷史文化、經濟社會各自不同之實際情況下，自然有一定的界限；因而，也有些學者主張除了「現代化理論」和「依賴理論」之外，要著重台灣這四十年發展過程中、國家與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功能，亦即要把此兩者的交互作用，和台灣的歷史與結構綜合起來；用這種「綜合途徑」(Comprehensive approach)方式，來研究分析「戰後台灣經驗四十年」的各種問題。

當然，祇要客觀冷靜地盱衡「戰後台灣經驗四十年」；難以否認的，台灣戰後，一方面確是深受歐美「現代化理論」之影響，在國人熱心追求「現代化」的努力下，產生了蜚聲世界的「經濟奇蹟」，改變了經濟、社會結構；產業資本主義化、社會結構多元化，在台灣漸漸形成、穩固。同時，也呈現台灣經濟愈來愈多第三世界「依賴理論」所指摘的病理病癥，不易擺脫國際經濟的「邊陲體質」；歐洲共同市場或日本的產經動態，國際貨幣市場或美金

匯率的升降，都會明顯而立即地影響變動台灣的發展與方向。不過，另一方面，確也不難發現台灣有相當獨特的歷史、文化與政治、社會特質，在戰後台灣四十年發展過程中，推擠融入相當獨特的「辯證作動」因素，極其錯綜複雜。換言之，就歷史、文化特質言，台灣與大陸之長年離合無常，彼此歷史因緣難免較大、大陸各省淡薄；而台灣島嶼孤懸海外的自然地理事實，使台灣在「現代化」發展步調上，與大陸產生「海洋文化」及「大陸文化」的差距。再就政治、社會特質而言：台灣戰後民主政治與社會多元化之發展，並非是社會上「現代化」思想逐漸成熟，然後水到渠成地由下而上自然地發展開來；而是政府執政黨以強大國家權力為背景，借助技術官僚帶動社會的「經濟現代化」，想以民衆之豐衣足食，獲得民衆之支持而穩固其政治結構之安定；惟一俟經濟日漸繁榮、多元社會形成，政治經濟權益密不可分之時，迺使民衆起而要求參與政治，確保社會公平正義，聲勢愈大，政府執政黨才由上而下、被動而消極地逐步退讓，以此上下互動的辯證方式發展而來。這種戰後台灣發展經驗所蘊藏的複雜的、動態的「變動函數」，用「綜合途徑理論」也許比較能客觀而正確地分析研究出來。目前，國內外不少學者也正朝著這種方向在探索尋覓。

按理，不論是持續延用「現代化理論」、或改弦易轍以「依賴理論」，來詮釋或批判「戰後台灣發展」的生理或病理；抑或用「綜合途徑理論」，除兼顧前此兩種理論外，更廣泛深遠的從歷史、文化、政治、社會諸因素交互作用功能，以求更客觀、更正確地理解或指出「戰後台灣發展」的真正史實或未來指標。無論如何，都不能再自我囿限於某種特定理論，或故步自封於狹隘的專攻分野世界，而必須以相當部門的「台灣戰後四十年」綜合研

究，做為通盤確認主體全貌、以及詮釋研究著述資料之基礎。問題是台灣戰後四十年來，由於政治、學術嚴酷之客觀事實環境，這方面研究相當貧乏窮困，難以因應國內外學術界之需要，也常成為國內外對台灣史和「台灣研究」有興趣的學術界人士，議論與感嘆的話題。

事實上，最近數年來，不少國內外學者常常指摘，在從事「台灣研究」時，戰前「清治時代」及「日據時代」的資料，較易蒐集覓致，其研究業績也較優秀客觀；相對的，在台灣史上最精華、對現代人類更具歷史借鑑的戰後台灣發展史的研究參考資料，反而極為匱乏不易找到。同樣地，國內學術、輿論、社會各界，也逐漸感到：在戰後台灣的歷史、地理、社會、文化的研究及教學上，台灣史和「台灣研究」，特別是「台灣戰後四十年經驗」，與中國史地、文化相較，似乎被擠居「邊陲地位」，要尋找客觀平實地撰寫「台灣現代通史」、或概要地紹述台灣戰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史實的著作，相當不容易。目前為數有限的學術界，專門深入的「台灣研究」著述，常是在一般庶民乃至學者遙不可及的境界，因此，一般知識階層或民衆，想以較短的時間及精力，通盤研讀書籍理解台灣戰後發展的脈動，的確相當不易，這不能不說是台灣社會及學術界，極大的憾事。

在台灣戰後大衆傳播及出版界中，自立晚報系統較早注意到這個問題。因而數年來，以「台灣研究叢書系列」、「台灣本土系列」方式，出版了不少有關台灣史及「台灣研究」的書籍。這不但鼓勵學術界人士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也因這類書籍編撰之平實大衆化，使社會民衆樂於購讀，而對台灣戰後發展增多認識理解，產生更深切的熱愛鄉土社會感情，貢獻深遠鉅大。年前，自立晚報社長吳豐山先生和同僚，為慶祝自立晚報成立四十週年社慶，研擬

邀請中年以下學者，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來撰寫簡明易讀、客觀公正的台灣戰後發展概史，名為「台灣經驗四十年叢書」，做為自立晚報社慶時，報社回饋社會的獻禮，邀商筆者諮諏意見。由於這正是自己心中多年的願望，喜不自勝，深怕報社猶豫躊躇、錯失良機，因而忘卻自己對「台灣研究」之陌生無知，不自量力地接下這部叢書的「總策劃」工作來。當時心忖自己濫竽學術界已久，祇要勤於向學界先進虛心請益、博徵衆議，也許勤能補拙、衆志成城。同時也思量縱令叢書出得不好，至少可收拋磚引玉、激勵日後這方面研究風氣之效。於是就陸續懇請林鐘雄、林玉體、林惺嶽、蕭國和、彭懷恩、張恆豪、鄭牧心、李筱峯、陳國祥、祝萍及王克敬等學者專家，從經濟、教育、美術、農業、政治、文學、議會、民主運動、報業及工業各方面，以有限的篇幅字數，簡明平實、客觀公正地紹述「台灣經驗四十年」的發展史。承蒙他們在諸事冗忙中，撰寫出有別於官方公報或官方囑託研究報告式著作，內容充實而令人感動，筆者衷忱感謝。

「台灣戰後經驗四十年」這段歷史中，不論有如何光明與陰暗、善美與醜惡、成功與挫折、進步與退化的經驗，對歐美及先進國家瞻矚未來，是極佳的參考資料，對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更是意義深遠的他山之石，對台海兩岸絕對是彌足珍貴的歷史鏡鑑。「台灣經驗四十年叢書」之付梓刊行，其意義比慶祝自立晚報成立四十週年社慶，也許更深遠、更值得我們深思。

一九八七、九、廿八於鸞齋

序

王克敬

過去三十多年，工業部門的成果，帶動對外貿易的高度成長，使台灣快速經濟發展的成就，成爲開發中國家的典範。

爲了促進工業部門的成長，在民國四十年代，政府採取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一方面嚴格管制工業產品進口，一方面對內限制設廠，並且以複式匯率，將外匯優先配給政府認爲應優先發展的工業。到了四〇年代中期以後，國內市場飽和，乃改採出口擴張的策略，將複式匯率改爲單一匯率，並積極獎勵出口。當時正值全球貿易迅速擴張，台灣工業發展搭上這一班順風列車，產品大量出口，締造了輝煌的經濟成就。

在台灣光復初期，日本人所留下的工業設備，大部份由政府接管，當時公營事業佔了相當大的比重。四十年代以後，政府一方面將適宜民營的公營事業移轉民營，一方面扶植民營企業設立，民間部門乃成爲推動工業成長的最主要動力。

在民營部門中，中大型企業及企業集團無疑地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它所雇用的員工人數、總產值都遠超過中小企業。從近十年來各個研究單位所公布的大企業及集團企業排名可

以發現，這些企業集團大部份都是在民國四十年代及五十年代就已經形成，而且多半和政府的保護措施有密切的關係。例如紡織業是四十年代全力發展的重點產業，目前有多家大企業集團是在四十年代從紡織業奠基的。當然，政府的保護，並不保證就能一帆風順，許多五十年代風光一時的紡織廠，在六十年代因無法承受石油危機的衝擊而倒閉。因此，從大企業的興衰調整，大致能掌握住台灣產業發展的脈動。

本書的目的，在探討中大型企業集團和產業發展的關係，及中大型企業集團成功的原因。紡織、電子資訊、塑膠、汽車等工業，是台灣的重要產業。此外，幾個以信託公司為中心形成的企業集團，經營型態上是以信託公司支持其它製造業分子企業的發展。近幾年來，連續數家信託公司發生重大金融風波，廣受各界矚目。這些都是本書探討的內容。

撰寫匆忙，若有疏漏，尚祈見諒。